

本館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謝娥與戰後臺灣婦女工作*

林秋敏**

謝娥（1918-1995）是戰後臺灣頗負聲望的女性，她在日治時期因參與反日行動而入獄，在獄中渡過兩年艱苦歲月。出獄後橫跨醫政兩界，除了自行開設康樂外科醫院，懸壺濟世之外，對於婦女運動與政治參與具有高度熱誠，當時的政商名流、青年學子以及婦女運動者常在康樂醫院2樓聚會，暢談時事。謝娥先後擔任臺北市婦女會理事長、臺灣省婦女會理事長、臺灣省婦女工作委員會委員、臺北市參議員、制憲國代、國民參政員以及立法委員等職，資歷之豐富，戰後臺灣婦女界無人能出其右。

謝娥被視為戰後臺灣婦女界的領導者，對於幫助婦女爭取職業、提供教育機會、廢除公娼以及鼓勵婦女參政等工作都非常積極的推動，更在制憲國大會議中，與婦女代表共同爭取婦女保障名額成功。雖然她在二二八事件中因廣播錯誤訊息而遭民眾誤解，但是在隨之而來的立委選舉中仍以高票當選。雖然謝娥並非國民黨員，但是她與國民黨關係良好，第一屆國大臺灣婦女代表晉見蔣夫人時即由謝娥安排引薦。不過，在國民黨政府遷臺前夕，謝娥卻遠赴歐美，直到1991年才回臺定居，錯失了在臺灣政壇發展的機會。

* 2006年6月2日國史館第141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有關謝娥的資料並不多，不僅第一手史料非常缺乏，連研究成果也付之闕如。有關謝娥的生平，本文主要參考應大偉的〈跨足學政兩界的臺灣奇女子—謝娥〉以及莊惠惇的〈臺灣政壇第一位女將—謝娥〉；而謝聰敏所訪述的〈謝娥女士談二二八〉，則記錄了謝娥個人的心路歷程，鄭玉麗女士口述的《鄭玉麗女士訪談錄》則提供了戰後婦女工作的梗概；有關戰後臺灣婦運論述與議題，本文則主要參考許芳庭所撰寫的〈戰後初期臺灣婦女團體與婦運議題〉，除此之外，本文主要以當時的報紙資料，如《民報》、《臺灣新生報》、《人民導報》等為主，探討謝娥推動戰後臺灣婦女工作的歷程。

《深耕雜誌》之研究*

蔡盛琦**

1980年代以後的黨外雜誌與政治運動相結合，辦雜誌除了為選舉宣揚理念，也成為公職人員的發言平台，這些雜誌社也大舉網羅了青年人材，同時予以組織及培養，正式成為黨外運動的新動力，也成了新舊兩代反對派人士反抗精神的傳承。在這黨外雜誌蓬勃發展階段，《深耕》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份黨外雜誌，它大膽直言的作風，讓它在同類型雜誌中一下子提高知名度，銷售量往上竄升。

本文以《深耕》雜誌為研究文本，談雜誌的創刊與發行，介紹其編輯成員，並分析它的內容單元及其風格，最重要的是探討它所掀起的黨外運動路線之爭。首先是1982年由對「杯葛事件」妥協的批判，進而演變成對康寧祥個人的批判（「批康」）；不久又因訪美四人行的歸來，針對《八十年代》所持的黨外路線發表一連串的駁斥；再由路線之爭提昇到黨外目標的堅持—提出「改革體制」的主張。它

* 2006年6月30日國史館第142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助修

掀起的批判風潮，迅速蔓延至其他的黨外雜誌；它所提出的議題，曾在黨外運動掀起一波波的論述，即使雜誌停刊後，這股批判風潮，並未隨著雜誌停刊而落幕，康寧祥受到黨外內部新生代為主的批鬥，長達三年多，「批康」的文字，多達1、20萬字；而以邱義仁等人為主所創刊的《新潮流》仍不改《深耕》時期的作風，又以「雞兔問題」揭開了黨外另一場紛爭的序幕。

太虛大師與《海潮音》雜誌*

侯坤宏**

太虛大師是民國史上最具魄力與最有眼光的佛教領袖，《海潮音》雜誌是民國時期歷時最久、影響最大，也頗具學術價值的佛教刊物。《海潮音》由太虛大師所創辦，太虛大師對《海潮音》雜誌的經營，投入極大的心力，他的著作大多發表在《海潮音》上；而太虛大師的佛教革新運動，也是透過《海潮音》來宣傳，可見《海潮音》與太虛大師的關係極為密切。《海潮音》在中國大陸發行的時間，從1920年到1949年。先是1918年，太虛在上海成立「覺社」，創辦《覺社叢刊》季刊，出版5期後，於1920年1月改為《海潮音》月刊，直到迄1949年4月，前後歷時30年，總共發行352期。先後曾在杭州、北京、上海、泰縣、廬山、漢口、武昌、重慶、昆明、衡陽、貴陽、南京、奉化、臺北等地編輯出版。太虛大師是《海潮音》月刊社社長，1947年3月太虛示寂後，由李子寬繼任。歷任主編有太虛、善因、史一如、唐大圓、張化聲、會覺、唐大定、楞伽山民、錢誠善、滿智、法舫、芝峰、大醒、葦舫、塵空、福善等人。《海潮音》雖常處動盪時局中，卻能秉持太虛大師倡導的「發揚大乘佛法真義，應導現代人心正思」宗旨，提供最符合

* 2006年7月20日國史館第143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於中國未來佛教發展的指針，對於當時的佛教界與知識界，都有極為深刻的影響，這是研究民國佛教史所不容忽視的一個議題。

本文分從由《覺社叢書》到《海潮音》的誕生、1920年至1935年的《海潮音》、1936年至1949年的《海潮音》等方面，探討太虛大師創辦《海潮音》、經營《海潮音》的過程與艱辛，藉以說明太虛大師與《海潮音》的關係，以及《海潮音》在民國佛教史上的地位與價值。

晚清時髦妓女的塑造*

張世瑛**

近年來，雖然已有許多學者（特別是中國大陸學者）注意到這個課題，但他們多半是將妓女看做是性別壓迫或資本主義經濟剝削下的受害者，即使是近期較新的妓女史研究，也仍不脫這種「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八股觀點。對於晚清上海賣淫活動的歷史，西方學者賀蕭（Gail Hershatter）與安克強（Christian Henriot）深入細緻的實證研究，已足以為我們勾勒出一幅肌理豐富、輪廓清楚的晚清妓女圖像；他們所關懷的是做為一種社會現象而呈現的妓女群體，對上海妓女的類別、等級與行為規則等，都有鉅細靡遺的描述。不過，他們的研究卻未能解答一些顯而易見的重要問題：例如上海妓業與明清青樓文化的關連？這些蓬勃興盛的上海妓業是否促成晚清性風俗的變化？妓女與晚清士人、商賈與新派人物之間的關係出現什麼樣的轉變？如果晚清妓女的確曾經引領時代風騷，它是否重新界定了清末民初的兩性關係與情色概念？以及做為晚清社會能見度最高的一個女性群體，這些妓女究竟擁有多少主動性來改變原本不利的地位？近代中國在強國強種的國族主義思想衝擊下，對於婦女的解放一直被視為是最重要的課題，但我們卻

* 2006年8月30日國史館第144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助修

很少去反省，在男性知識分子與國家權力的聯合主導下，是否對婦女形成了另一種日常生活中的無形暴力？

從1842年上海開埠以來，將近有一個世紀的時間，上海的妓女，特別是高級妓女成為這個新興的商業社會中能見度最高的一個女性群體，也是極少數能自由地拋頭露面、展現自我，具有主體意識的女性，本文將試著跳脫以社會史的角度來描繪晚清賣淫事業的傳統觀點，以晚清上海的幾位名妓為觀察對象，重新認識這些妓女是如何在一個求新求變的時代裡，敏銳地掌握時代脈動，重新詮釋「時髦妓女」的定義。

1960年代臺灣的外貿制度與經濟發展 以制度創新與制度變遷為中心*

許瑞浩**

1960年代是臺灣經濟成長最快速的階段，也是經濟發展開始突飛猛進的時期。在此期間，臺灣建立一套有效的對外貿易制度安排，從而確立了往後數十年皆以出口導向拓展國外市場為主軸的經濟發展方向。臺灣的經濟發展是一連串的制度創新與制度變遷，並透過制度去建立市場經濟的過程，亦即由管制計畫經濟逐漸過渡到自由經濟的制度化過程。制度是經濟成長與發展的關鍵因素，本文應用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制度變遷理論做為分析架構，結合史實，循由「制度均衡→制度失衡→制度需求→制度供給→制度創新→制度變遷→制度均衡」的理路，闡述1960年代新的外貿制度安排與制度環境的成因、選擇、設計、產生、實施、創新、變遷，及其對當時臺灣經濟發展的影響。囿於研究斷限只有十

* 2006年10月4日國史館第145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助修

年，較難看出「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的演變和影響，是故本文專致討論「正式制度」(formal institution，以政府頒行的法令規章為主)及其「實施機制」(enforcement，以政府機關為主)。

本文共分六節，第一節是前言，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是透過新制度經濟學制度變遷理論基本概念來建立分析架構；第三節是從制度需求的角度來說明戰後初期的舊制度結構無法因應1950年代新的經濟情勢，而導致制度失衡，產生對新制度的需求；第四節是從制度供給與制度創新的角度來探討1950年代末期至1960年代初期外貿制度的創新和實施；第五節是從制度變遷的角度來分析新的外貿制度安排對1960年代臺灣經濟發展的影響；第六節是結語。

在制度失衡與制度需求方面：1950年代後期，發展出口工業與拓展對外貿易的潛在利益已然浮現，但新制度卻遲遲未能產生，一些過時而無效的制度仍繼續實施，使經濟成長趨緩，經濟發展遇到瓶頸。由於制度失衡情況嚴重，對出口導向的制度需求愈來愈強烈，遂引發以外匯與貿易改革、「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獎勵投資條例」為中心的一連串制度創新與制度變遷。

在制度供給與制度創新方面：(1)1958年開始的外匯與貿易改革，主要透過貶值新臺幣、實施單一匯率制度、放寬進口管制、強化鼓勵出口措施等新的制度安排，由消極限制進口改為積極鼓勵出口。

(2)1960年1月公布的「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是對財政、金融與經濟提出全面性的革新方案，確立了發展出口導向產業、拓展對外貿易的政策基本方向。(3)1960年9月制定的「獎勵投資條例」，主要利用減免稅捐、方便取得工業用地等手段來獎勵投資、儲蓄及外銷，除了消極排除原有法令制度所形成的投資障礙外，還積極提供經濟誘因。三者相輔相成，共同締造一個有利於發展出口工業、拓展對外貿易的新制度環境。1965年開始設立的加工出口區更是集大成的制度創新。另一方面，新制度的實施機制是以政府機關為主，而由壟斷性公權力有效執行，因此是一種「強制性制度變遷」；雖仍具有某些

消極性的限制，但也有許多積極性的激勵措施，因此自我形成誘因結構，以做為公權力的補助性機制。

在制度變遷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方面：透過新的制度安排，建立了充滿誘因的制度結構，進而形成「增加所得、增加儲蓄、增加投資、增加生產、增加外銷」的良性循環；使臺灣在工業發展、對外貿易、勞動生產力、出口成長率以及經濟成長率等方面，都是當時世界上成長最快的國家之一，而且兼具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並達成經濟穩定與經濟成長雙重目標。然而，1960年代的外貿政策本質上仍屬於管制保護的，仍以高關稅政策及外匯、進口管制等手段保護國內產業。外匯改革並未徹底自由化，對外貿易的管理辦法及行政手續仍嫌複雜煩苛，引發一些流弊，降低改革的整體效益。

1960年代外貿制度的創新與變遷，顯現出功能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濃厚色彩，且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與階段性任務，是為解決迫在眉睫的經濟難題而臨時採行的。政府在權衡成本效益後，透過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在嚴密的管制體系中，審慎打開一個缺口；於是民間積蓄壓抑已久的經濟活力紛紛投入國外市場，適逢世界經濟繁榮，國際貿易興盛，致能創造卓越的經濟成就。總之，1960年代外貿制度創新與變遷，是因應新的經濟情勢而產生，有著一定程度的被動性，但方向正確，時機恰當。

1933年國民政府對新疆變局之因應*

高素蘭**

新疆孤懸塞外，名雖行省，實則幾同化外。民國以還，一直處於半獨立局面，與中央之關係，不過名義而已。國外勢力野心勃勃的想

.....

* 2006年10月24日國史館第146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將新疆納入其勢力範圍內，國內政局又動盪不安，國民政府雖欲直接控制新疆，然鞭長莫及力有未逮，但亦不能任由置外於中央，故嘗試藉由各種方式完成對新疆的控制。1933年新疆發生「四一二政變」，引起人事更迭，國民政府乃策劃控制新疆，兩次派員入新，結果均告失敗。

本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說明研究動機，要探討的主題。

第二章盛世才與四一二政變。1933年4月12日發生「四一二政變」，推翻金樹仁，盛世才被推為臨時邊防督辦，希望儘速取得中央的正式任命，成立合法的新政府。然中央準備時機成熟時，藉機控制新疆，對新政府任命一事，採保留態度，聲言「正慎選賢能主新」。

第三章黃慕松入新宣慰。黃慕松入新宣慰，表面上是代表中央宣布德意，協和各族，遏止動亂，實際上是準備藉機調整省府人事，拉攏各方力量，削弱盛之力量，實行中央對新疆的控制，致發生「二次政變」，不得已只好真除盛世才。

第四章羅文幹入新視察。中央改變直接插手的方針，派羅文幹入新疆，讓新疆盛、張、馬三大勢力，保持平衡，相互牽制，以達到間接控制新疆的目的。羅調停和牽制平衡，先在迪化因盛、馬交戰而破壞，繼之又在伊犁遭張元培拒絕。繼而撮合張馬倒盛，形勢對盛世才更加不利，為解除困境，盛轉向蘇聯請求協助其收平新疆亂事。迪化之圍遂解，而中央對新疆控制的希望亦隨之破滅。

第五章結論。分析國府對新疆變局因應失敗原因：(1)沒有軍事力量作後盾。(2)黃慕松舉措失當。(3)羅文幹策略錯誤。(4)蘇聯軍事援助。